

环境问题反思： 多一点技术，少一些意识形态

■刘永谋

China Goes Gree: Coercive Environmentalism for a Troubled Planet (本文作者译为“中国走向绿色：适于危机星球的强制环境主义”，以下简称《中国走向绿色》)一书近来有些“火”，应该与作者之一的夏竹丽(Judith Shapiro)赫赫有名有关。

夏竹丽女士长期研究中国的环境问题，上世纪80年代曾长期深入中国中西部地区实地调研，在中国还收获了爱情。后来，她的博士论文从环境角度研究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设史，独辟蹊径，反响强烈，在中国也收获不少粉丝，尤其是在中国研究和环境史领域。

《中国走向绿色》延续了夏竹丽对中国环境问题的一贯立场，对近年来中国的环境政策方面的转变，尤其是对生态文明的强调，进行政治哲学的深入分析，提出不少有趣的观点。但是，总的来说，该书意识形态色彩太明显，论证先入为主的色彩太明显。

我认为，谈环境问题必须多一点技术，少一些意识形态。

正如本书所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强调经济发展，对环境保护重视不够。实际上，环境保护意识当时在中国刚刚滥觞，有些欠缺实属正常。对此，我有切身体会。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大学学的是环境工程与管理专业，那时环保产业在中国刚刚起步，因此毕业之后工作不好找。

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提倡可持续发展观和生态文明，对环保问题非常关注。尤其十八大以来，政府投入大量财力物力整治环境，收效明显。

比如通过几年时间，北京雾霾频发的状况已得到极大的转变，即使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感到震惊，更不用说外国人了。

以前保护环境欠缺，一些外国人批评中国为经济牺牲环境，中国人的健康权受到威胁；现在保护环境得力，一些外国人又批评中国用威权(authoritarian)方式治理环境，中国人的自由权受到威胁。保护环境不行，不保护也不行，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在环境问题上，中国没有办法照搬美国，因为美式民主制很难为保护环境而采取集中措施，而这又是保护环境必需的方法。

美国上一届特朗普政府退出相关环保条约，反映出很多美国老百姓不支持奥巴马政府的环保政策，觉得这些政策牺牲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对于环境问题中的“市场失灵”很多人讨论过，这里无需赘述。

环境保护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显然，一些学者在反思环境问题时的基本立场存在问题，他们不知变通地固守一套陈旧观念不能说明现实，更不能应对问题。

民主制真的不能很好地应对环境问题吗？有些人认为，民主制不能采取集中式、强制性的措施。可是，谁说民主制只能等于无休止无结果的争吵呢？我不这么认为。



China Goes Gree: Coercive Environmentalism for a Troubled Planet, Yifei Li, Judith Shapiro 著, Polity Press 2020年7月出版

今日之美式民主制，建立在极端个人主义、长期的反智传统和失去共识的自由主义基础之上，此种民主制的确实不适于应对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牵涉面广，涉及各方面利益，从技术上说需要集中统筹处理。

但是，民主制只能是今日美式民主制一种吗？更强调纪律的德国民主制、日本民主制与美式民主制完全一样吗？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与美国也根本不同。从理论上说，民主制不一定要“捆绑”极端个人主义、反智主义和自由主义。

我认为，民主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利用一些高效的社会工程手段。当然，民主制也要控制此类技术治理措施，防止专家权力过大，威胁民主制的基石。我们不能排斥所有的效率工具，简单地斥之为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而是应该深入细致研究之，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选择、调整和控制，使之成为民主制服务。

在环境问题上，亦是如此。如《中国走向绿色》一样，简单地将中国的环境问题归结为“威权环境主义”，然后或者为之辩护，得出环境问题正逼迫世界走向威权主义，或者专事批判，得出中国以保护环境为名大搞威权主义——此类意识形态争吵陷入二元对立思维，不能深刻地反映中国环境问题的真实状况。更重要的是，在意识形态争论中，地球环境在持续恶化。

二

在过去几年中，我集中研究技术治理理论。

“我甚至认为，当代社会已经是技术治理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拒绝技术治理，不能对之进行深入研究，就会使之成为“房间中的大象”。

传统西方观念总是把技术统治论等同于“机器乌托邦”，即它的目标是把整个社会变成一架大机器，而把每个人变成机器上随时可以替换的零件。

但这是错误的印象。无论是从历史上的技术统治论运动，还是从理论上分析，技术治理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

所谓的技术治理，指的是在社会运行中运用现代科技成果的治理活动。在英语中，类似的讨论相当一部分是被归结为“技术统治论”(technocracy)之下。但是，“技术统治论”一词带有相当的贬义色彩，故而我采用“技术治理”这一新概念，将技术统治论作为其中的一种，希望以更为客观中立的态度来审视技术治理现象。

显然，进入21世纪之后，技术治理已经成为公共治理领域全球性的基本趋势，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大大地推进了技术治理趋势。

2020年，我与美国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德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德曼在《中国科学报》上讨论各国疫情技术治理模式比较，引发技术哲学界的强烈反响，富勒、尚伯格等学者纷纷回应。

不管观点和立场如何，没有人能否认技术治理在疫情应对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甚至认为，当代社会已经是技术治理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拒绝技术治理，不能对之进行深入研究，就会使之成为“房间中的大象”(指一些非常显而易见的却一直被忽略的问题)。

传统西方观念总是把技术统治论等同于我所谓的“机器乌托邦”(machine utopia)，即它的目标是把整个社会变成一架大机器，而把每个人变成机器上随时可以替换的零件。

但这是错误的印象。无论是从历史上的技术统治论运动，还是从理论上分析，技术治理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比如，北美技术统治论运动一经兴起就传入中国，民国时期尝试过，结果与美国差别

非常大；而智利阿连德政府曾尝试过“赛博协同工程”，具有明显的拉美色彩。

因此，技术治理不等于机器乌托邦，并不必然等于极权主义。民主制可以利用技术治理为自己服务，将之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

最近，我正在写一本名为《技术治理》的专著，提出了一整套全新的理论，尝试理解、选择、调整和控制当代技术治理活动。

就环境保护而言，想要收到治理实效，任何国家都需要采取一些高效的社会工程措施，不能简单地斥之为“威权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指责不利于深入研究问题，尤其会阻碍民主制利用技术治理处理环境问题的努力。

当然，如此说并不是认为社会工程措施在实施过程中不会出现问题，比如效率不如预期、权力越界、某些人群生活受到影响等，但是不能因此而全盘否认效率工具在解决环境问题上的重要性。更有建设性的态度应该是具体地分析其中的问题，更好地利用和控制技术治理。

总之，应对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但是太多意识形态、太少技术讨论，无益于治理环境和改善生态。

环境哲学中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从根本上都是价值观念争论，并没有科学意义上的对错。不要忘记，类似意识形态争论的目的，是为保护环境做更好的理论辩护。

因此，比意识形态争论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下决心采取措施治理环境，并且为此做出牺牲——哪怕是牺牲一些便利，改变一些生活方式。原因就是人类希望在地球上延续得更长久一些。

在即将出版的新书《疫情应对与技术治理》中，我提出“环境问题的科技谦逊主义”的观点，认为：(1)客观看待科技的力量；(2)要从“征服自然”彻底转向“敬畏自然”；(3)反对自然观的一元论，主张自然观的多元论；(4)从保护环境转向保证人类种族延续。

科技谦逊主义体现在传染病防控与应对的问题上，就集中体现为“敬畏病毒”的根本态度。事实上，我并不赞同“环境保护”的说法，因为人类保护不了环境，环境也不需要人类的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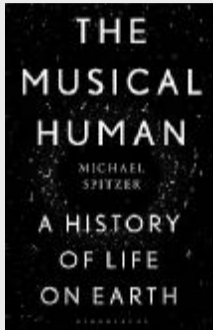
比如地球遍布塑料袋，被灭绝的肯定是人类，绝不是生命。地球经历过小行星撞击、大规模火山爆发，生命并没有被灭绝。许多显赫一时的地球物种消失了，例如曾称霸一时的恐龙。

反过来，生命又极其顽强，比如病毒，几乎和地球一样古老。在深海海底、在火山口，在完全没有氧气的环境中都发现过生命的痕迹。所以，“保护环境”的说法有些狂妄。

人类之所以不要污染环境，是为了不要把自己毒杀。此次新冠疫情清楚地说明人类根本没有多强大，面对新冠病毒，人类保护自己都很吃力。

一言以蔽之，环境问题反思，可以多一点技术，少一点意识形态，如此更有利于人类真正行动起来。

域外



地球上的第一个乐音是约1.65亿年前一只树鼩振羽时发出的，属于“自然音阶中的E音调”。这是科学家根据琥珀中保存下来的一个树鼩遗体的形态推断出来的结论。

4月，英国Bloomsbury(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利物浦大学音乐学教授Michael Spitzer(迈克尔·斯皮策)的著作——*The Musical Human: A History of Life on Earth* (本文作者译为“音乐人：大地生灵的历史”)。这里的“音乐人”不是指以音乐为职业的人，而是说音乐是人类的一种特质，正如其他领域中有“经济人”“信息人”等说法一样。

斯皮策在2020年出版了*A History of Emotion in Western Music* (《西方音乐情感史》)，这部《音乐人》是斯皮策音乐研究成果的续篇。

斯皮策雄心勃勃，他想对纵向跨越几千年、横向跨越不同文化的音乐史做出解释。本书概述了人类和音乐的历史，涵盖了纷繁的事实，但写得通俗易懂。读者即使不了解音乐理论，也能跟不上本书的论证节奏。当然，如果读者本身就能够欣赏音乐且对古代史有一点了解，则阅读本书收获更大。

斯皮策拥有一种聪明的甚至是狡猾的幽默感，例如，他说“幸福是温馨的里拉琴”。他还善于做有趣的观察评论，他说“与其说荷马史诗中的塞壬像是鸣禽，还不如说像是鲑鱼”。于是，本书的深刻道理之阐发也变得轻松了。

本书分为三大部分：生命、历史、进化。作者先对现代智人的音乐能力之发展做了细致梳理，然后讨论了西方音乐的三大“杀手级APP”——音符、五线谱和复调，这几项使得音乐不再受肌肉记忆、地点和社群的束缚，不再受说话的自然节奏之束缚。

东方有些不同。在伊斯兰世界里，这三样不大突出，他们关注的是装饰音和说话声音的流畅性；印度人关心音乐之下的精神统一性；中国人则主要是按照音色而不是音高来组织音乐的。

接着，斯皮策探讨了是什么因素使得西方古典音乐如此具备病毒般的传播力(乐谱是书写下来的音乐，可以超越口头传习的方式而获得广泛传播)，西方古典音乐的未受受众又在何处(他的答案是“东南亚”)。

斯皮策在书中写道，地球上的第一个乐音是约1.65亿年前一只树鼩振羽时发出的，属于“自然音阶中的E音调”。这是科学家根据琥珀中保存下来的一个树鼩遗体的形态推断出来的结论。

他还考察了蚊子的“爱情”生活。雄蚊子想吸引雌蚊子时，振翅频率为600赫兹，发出的声音接近自然音阶的D音。雌蚊子的振翅频率一般为400赫兹，接近自然音阶的G音。然而，它俩在交配之前都会将振翅频率调整到1200赫兹，即比雄蚊子先前的自然音阶D音要高出迷人的8度。斯皮策补充说，“人类所咏唱的一切不过就是这个现象的一个注脚”。

人也许是创作音乐能力极强的动物。但是，即使没有人类，地球也是个音乐地球。哪些因素使得人类很特殊呢？

人的生理因素可提供部分答案。例如，人类的声带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有很大的差异，人类取双脚直立行走的姿势，这使人类演化出了理解和模仿节奏的独特能力。另外，人类具备鸣叫学习能力，即能够模仿一些声音，并能调整这种声音以适应新环境。除了少数几种鸟类，其余动物在这方面都远不及人类。

本书的最后，作者论述道，“音乐人”是了不起的物种集大成者，他们融汇掌握了昆虫的节奏、鸟儿的旋律、鲸鱼的音乐传统和猿人的社交智能。

由于斯皮策兴趣实在广泛，他还花了一点笔墨来讨论音乐家的“晚期风格”，典型例子如“走向衰老的作曲家的成果”，还有英国摇滚手大卫·鲍伊的最后一张专辑《黑星》。他悲叹，当代音乐生活中“听音乐”和“做音乐”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他也展望了音乐未来发展的一些可能趋向，如音乐众创、互动式作曲和音频输入。

总之，斯皮策认为，“大地上的所有音乐很可能都有人的痕迹”。

人人都是「音乐人」

■武夷山

听！247位天空中的“歌唱家”

■邹桂萍

的观鸟。

人们公认的“现代观鸟之父”是18世纪的英国牧师吉尔伯特·怀特，他观察并记录在其教区内生活的鸟类，最终形成了《塞尔伯恩博物志》一书。书中用诗意的文笔描述了鸟类的的生活习性与生活环

境，将观鸟上升到哲学和美学的高度。现代观鸟行为的出发点是观鸟者自身的兴趣、对鸟类的好奇和对新知的渴望。在观鸟期间，人们注重观察鸟类的形态特征、行为习性和栖息环境，甚至关注鸟类保护和生态保护的话题。观鸟的结果是个人知识的丰富，乃至于各种鸟类图册和博物书籍的出现。

只有当社会上上层阶级食有余粮，而且热衷于了解鸟类的时候，观鸟行为才有可能出现。

我国春秋时期的师旷撰写了中国的第一部鸟类学专著《禽经》，谈及60余种鸟类的命名、形态和习性等内容。后来西晋文学家张华为该书疏注，补充了许多内容。三国时期的学者陆玕研究了《诗经》中的鸟类，并写了一本《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描述了20多种鸟类的形态特征和生活习性。

不能忽视的是，中国历朝历代皆有优秀的花鸟画作传世。南北朝时就已经出现不少花鸟绘画作品，如顾恺之的《凫雁图》、顾景秀的《蜂雀图》等。到了唐朝，边鸾将花鸟画作为专门的绘画题材，开启中国花鸟画的盛世，因此被称为“中国花鸟画之祖”。

从这些传神的花鸟画中看到各种栩栩如生的鸟类，而这些作品对鸟类的形态特征进行如实记录，又何尝不是优秀的博物学作品呢？

二

19世纪，美国博物学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用12年的时间，绘画并记录了美洲大陆近500种奇妙的鸟类，形成鸟类绘画专著《美洲鸟类图谱》。这本图谱是19世纪最伟大和最具影响力的博物著作，被誉为“鸟类圣经”。

奥杜邦留下的这些鸟类图谱不仅是科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同时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是让人惊叹的成就。

但是这惊人的成就背后是后膛猎枪的发明

给鸟类带来的巨大灾难。19世纪中期，观鸟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奥杜邦在日记里呼吁人们不要滥杀鸟类和破坏生态，然而为了近距离地观察鸟类特征，为了精准地绘制图谱，又有多少鸟类死在他的猎枪之下呢？

1886年，奥杜邦去世35年后，一个名为“奥杜邦学会”的环境保护团体成立了，众多科学家、教育家和志愿者共同参与了保护鸟类的工作。

英国的鸟类保护协会(即后来的皇家鸟类保护协会)也于1889年成立，帮助抵制“采集标本”的观鸟形式，鼓励单纯地进行观察。

遗憾的是，环保工作的推手依然阻止不了逐利的商人和疯狂的猎人。

比如19世纪，旅鸽家族有几十亿的“鸟口”，可能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鸟类。当迁徙的旅鸽飞越北美上空的时候，天空像刮起了龙卷风，铺天盖地都是它们的身影。但是由于人类的枪杀、炮轰、网堵、投毒，无所不用其极，到了1900年，世界上最后一只旅鸽死亡，一个种族宣布灭绝。旅鸽的墓碑上写着一句话：“该物种因人类的贪婪和自私而绝灭。”

《鸟鸣时节：英国鸟类年记》中提到，地球约五分之一的鸟类面临着生存威胁，其中200种将在本世纪内消失。

在英国，游隼、红背伯劳等鸟类的数量在持续减少，引发了人们对人类的盗猎和侵占鸟类栖息地等行为以及气候变化影响鸟类生存的思考。赤鸢、反嘴鹬等鸟类一度在英国某些区域无法见到，后来经过重新引进和细心呵护，这些鸟儿再次在英国的园林中唱起了歌儿。

三

如今，观鸟指的是在自然环境中观察鸟类，包含了不影响鸟类的正常生活之意。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没法像奥杜邦那样，专门用十几年的时间去观察鸟类，更没法接触到那么多不同的物种。

但是，在望远镜和长焦相机的帮助下，我们可以远距离地观察鸟类的的生活。在雷达和微型摄像机的加持下，科学家得以研究鸟类的生存繁衍和迁徙习性。



《鸟鸣时节：英国鸟类年记》,[英] 布雷特·韦斯特伍德、斯蒂芬·莫斯著，朱磊、王琦、王惠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定价：78元